

武昌縣文史資料

第四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昌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

武昌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

H185/0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武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十月

封面题字：陈义经

封面设计：方 京

武昌县文史资料（第四辑）

编委会：沈惠东、何正益、金 锋、夏 康、孙先福
韩宗旭、李崇训、祝匡时、吴汉才

责任编辑：何正益、韩宗旭、孙先福

· 内部资料 ·

目 录

日本侵略军在我村的罪行·····	汤立规 (1)
日本侵略军在大屋陈的血债·····	陈启铭 (4)
“八刀半”秦高涛·····	祝匡时 (7)
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经过·····	韩宗旭 (10)
中原突围亲历记·····	张少卿 (16)
忆武昌县民盟组织地下活动·····	肖连城 (20)
举旗梁湖畔 就义武昌城·····	熊子华 (23)
老红军郑福堂·····	罗兆安 (28)
王志坚传略·····	童维军 (33)
回忆唐义精校长·····	李家楨 (37)
京剧大师谭鑫培轶事·····	孙绍彭 (42)
建筑金水闸副总工程师李鸿斌·····	祝匡时 (45)
财政金融家沈质清·····	童维军 (47)
韩佐卿事略·····	余遂生 (51)
热爱教育的邓柳五先生·····	李香甫 (55)
现代诗人伍禾·····	余遂生 (58)
中山舰的光辉战斗历程·····	汪世喜 (60)
金口祭奠中山舰阵亡烈士活动纪实·····	汪世喜 (64)
对商震将军在抗战初期的片断回忆·····	宋伯雅 (66)
朱怀冰与陈希平之间的明争暗斗·····	况树人 (70)
武昌县一中前身武昌县简易师范·····	魏汝霖 (73)

在淮山讲习的日子里.....	孙绍彭 (77)
伪太平乡长制造教师冤案始末.....	熊子华 (80)
从事工商业的经过.....	田平卿 (86)
建国初期中央公粮武昌县支库.....	孙俊民 (91)
清末民国时期金口慈善公益事业.....	韩宗旭 (96)
毛集收纳仓贪污舞弊案.....	陈启铭 (99)
日伪时期武昌县合作支社.....	陈启铭 (101)
基督教湖北圣公会会长 辛亥革命日知会创始人黄吉亭.....	余遂生 (104)
我家与基督教.....	伍齐喜 (108)
“万珍图”记.....	黄德全 (114)
大地主、资本家张翼云接受清算经过.....	张先托 (119)
金水农场春秋.....	祝匡时 (122)
纸坊今昔.....	唐禄生 (131)
陈幼云诗六首.....	陈幼云 (137)
江夏联话.....	朱耀荣 (138)
武昌县文物考古.....	杨锦新 (142)
民国时期武昌县政府机构和历任知事、县长.....	金 锋 (151)
读《武昌县文史资料》二、三辑有感.....	邹和镒 (155)
准确的语言 真实的写照.....	吴汉才 (159)
对《秦放起义》一文的意见.....	李香甫 (162)
政协武昌县第三届委员会正副主席、常委及委员名单	何正益 (164)
各民主党派、侨联和工商联其负责人.....	政 统 (167)

日本侵略军在我村的罪行

汤立规

1938年，武汉沦陷后不久，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就踏进了我所居的湾村。从此，村里群众和所有沦陷区人民一样，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前，没有过一天安宁的日子。我村汤家湾是宁港乡较大的村庄。它西临京汉铁路，东靠五（五里界）土（土地堂）公路。侵略军路过，不是短期在村里驻扎，就是临时到村抢劫；平时驻扎在宁港桥头的侵略军，亦不时来村骚扰，弄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恐怖中渡过的。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已投降四十五年了，但在我村所犯的罪行，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家遭浩劫

听说日本侵略军要到武汉了，全村群众不知所措，有的说日本侵略军来了烧杀奸掳，无恶不作，不如把猪杀吃掉，把牛卖掉，把房子烧掉，然后逃难去；有的说，一家老小能走到那里去啊，不如守在家里，是死是活听天由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过几天，一队日本侵略军果然向村里开来，村民仓惶躲避。我们一家躲到湾子后面山坡下事先挖好的洞里。原以为侵略军只是路过，不料却驻下了。由于洞里准备的干粮（炒的大麦粉子，吃时用水一拌）不多，又怕暴露目标不敢烧火，日子实在难熬。在洞里没过几天，全家人不得不趁着黑夜抄小路远奔姨父家暂避。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直到日本侵略军撤离才回村。到家一

看，家徒四壁，门窗洞穿，家俱什物荡然无存，只有一堆堆的马粪仍然散发着臭气；我父亲在宁港桥开的一家药铺，也遭到同样浩劫，药柜、用具及炮制药的设施全部被毁。全村五十来户人家也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打这以后，我家就一蹶不振，过着更贫苦的生活。

人畜不宁

在沦陷的八年中，日本侵略军除短期驻扎大肆抢掠破坏外，还经常骚扰弄得人畜不宁。因为我村处在铁路和公路之间，村子又比较大，路过的日本侵略军差不多都要进村里来，多则十人，少则三、五人，不是捉鸡牵猪，就是找妇女寻欢作乐，也有时强拉民夫或搜查“土匪”。时间长了，群众为了生产、生活，总结一些对付的办法，这就是及时报警，年轻男女就跑到后山园林中避避，只留老小在湾里；如遇大批侵略军连续几天在公路上过，躲入山林中的人，有的到亲戚家暂住，有的白天送饭去吃，晚上回家睡。但是在家里的老小，有的也难逃侵略军的欺压和凌辱。一天，一个叫汤德纯的老年人，对日侵略军牵他的猪流露出满情绪，一个侵略军就顺手拿起一个粪耙，把这个老人的一只耳朵挖掉了。后来每逢侵略军到村，不光是年轻人躲了，而且连鸡猪也想法藏起来。我村门前不远有条港，各家就在港坑下面打洞，用来隐蔽猪鸡。家家户户每天早晨，猪上绳，鸡关笼，送到港边洞里去，以免鬼子来了收藏不及。采取这些办法也不是万无一失的，有时也有被发现而遭受损失的。这些事实使我从小就懂得了一个道理：国无宁日，家亦无宁日。

惨遭毒打

1941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在土地堂驻扎的皇伪军，深夜悄悄

潜入我村，分散隐蔽在各家通向后山园林的后门口，等天亮抓从后门出来上山的“土匪”。第二天清晨，我去本村私塾上早学（即早自习），走到校门前，见一个人穿过学校向后山园林中跑去，被躲在屋后阴沟里的皇伪军发现，追了一阵，没有抓到。几个皇伪军返转来问我：刚才跑的是什么人？我确实不知道，回答不出来。于是他们把我叫到学校旁边的一个酒灶墩子上，要我跪下，继续追问我，边问边打，拳打脚踢，打得我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这是我出娘肚子后第一次遭到的毒打，它使我进一步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人亡家破

在日本侵略者最后一次攻打湖南长沙的那一年，大批日本侵略军从宁港桥过了几天几夜。这次侵略军路过，我村被抓走三个人，去帮他们运送军需物资。这三个人叫汤先节、汤德清、汤立桢，按辈分刚好是三代人。他们走后，跟家里偶尔有个信回，一路上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几次逃跑都未跑掉，而每次抓回是一顿毒打。过了衡阳之后，就失去了联系，至今杳无音讯，已死无疑。汤先节单身一人，汤立桢尚未成家，他们人一死，就意味着家也亡。在日军侵略我们中国的八年里，像他们这样人亡家破的以千万计，何止他们三人两家！

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已铭刻于全村、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不会，也是不应该忘记的。

日本侵略军在大屋陈的血债

陈启铭

1938年10月至1945年8月，日军侵占我县期间所犯的罪行，是很难计算清楚的。现在仅就日军在大屋陈乡所犯罪行，简述如下。

1939年7月上旬一个上午，我们大屋陈乡仓湾陈村（现属张湾村）的人们，刚吃罢早饭，忽听有人喊：“东洋人来了！”。我站在大门口一望，只见兴屋黄岭上已经有人在奔跑。我那年15岁，还在读书，见此情况，忙和两个小同伴向村后跑去。刚到岭后，就听有人喊：“来的是骑兵，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我们三人赶忙跑到岭下的田家山。这年雨水很多，梁子湖水已涨到田家山下。我们上山后便找了个大荆棘丛，匍匐着钻了进去，在两个坟墓中间的凹地上卷伏着。每人都瞪着一双大眼睛从枝叶的隙缝中向外窥望。不多久隐约听见后跑上山的人说“12个日本骑兵已进村了”，我们更是大气不敢出。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有个小同伴用手指向湖边，低声说“来了”。我循着他的指向望去，只见一个日本兵平托着枪眼手蹑脚地沿着湖边小径向前搜索。幸而我们上山时把身后压倒的茅草扶起来了。日本兵未发现我们的痕迹，沿着小路向葫芦山的方向走去了。葫芦山是我村下面靠湖边的一座大山，三面环水，一而通陆，距村子约一千五百米，山的面积约50余亩，当时长着灌木丛和一人合抱的大松树，还有竹林（现已辟为村的茶园），是一个藏人比较理想的地方。这个日本兵走到距我们约五百米的湖滩处，草丛里突然跳出一个青年向日军扑去，与日兵扭打起来，他用尽手段未如愿，也

许自知敌不过对方，于是用力把日本兵向后一推，转身跳进湖里，潜入水中，游到离岸约三丈多远的地方，方伸出头来换气。日本兵似乎从慌乱中清醒了过来，举枪向湖面射击。枪声引来了另一个日本兵，二人轮番向湖面点射，一直持续了二十多分钟，见湖面平静如常，才悻悻离去。这个青年在水中潜伏过久，终于牺牲。日本人走了，人们把他的尸体打捞上来，他两手还各抓着一把湖草。他名叫陈之慈，时年17岁。我和同伴们回到村里，只见村中各家所有门板被抢掠一空。我走近家门口，只见我舅父被日本兵打死在门外。我的舅父原是居住在武昌徐家棚的贫民，当时五十多岁，因逃避日本人全家迁到我家暂住。日本兵来时他感冒卧病在床，逃避不及，被抓住。据另一个同时被抓住打得奄奄一息的陈和风老人讲，日本兵要他们抓鸡、找“花姑娘”，他们不去，就被毒打。我舅父是被日本兵活活打死的。陈和风老人因伤势过重，过了一天也逝世了。这次仅我村就有三名无辜者被日本兵残杀了。据说还有不少别村的农民也深受其害。这些农民是被日本兵强行拉来背门板的，有的大门门板又大又沉，特别是祠堂的一对门板，每扇重约百斤，日本兵强令每人至少要扛一扇，他们却骑在马上押催，凡是稍微走慢一点的，不是用马鞭抽，就是纵马咬后脑袋，扛的人只好一路小跑，从我村到五里界，步行走得快也得一个半小时，面此有的人累得当时吐血。后来很有几个人因吐血不治身死。

日本兵初来几年“威风”很大，在五里界镇四周筑棚设卡，要进五里界必须经过日本兵站岗的哨口，要拿出“良民证”，还要鞠躬，稍一不顺他的意，轻则挨耳光，重则遭监禁。当时大屋陈乡的人民，不是万不得已是不到五里界镇去的。1941年后，驻扎在五里界的日本兵减少了，为防备游击队袭击，他们在潘刘村挖了一个地洞，晚上日本兵都进了洞。洞口架上机枪，有兵把守，洞中备有食物和水。五里界镇四周的岗哨全部撤去。但还有少数日本兵，自持所谓的武士道精神下乡骚扰。其中首恶是日军

“宣抚班”班长柏元。此人据说会武艺，徒手搏斗，五、六人不能近身，他双手会同时打枪。他经常化妆成商人在四乡活动，并收买汉奸为他打探消息和做他下乡的落脚点。我姑父就是他亲手杀害的。

我姑父住在罗立生村（现属罗立村）。这个村当时只有七、八户人家。姑父姓罗，排行老四，平辈人称他罗老四，下辈人称他罗四爹。少年时读过不少书，成年后种庄稼，是一个很老实什么政治活动都不参预的农民。他的侄儿罗炳华是有名的抗日先进分子。叔侄俩虽已分居多年，但住的同一栋房子，我姑父住前面，罗炳华住后面。罗炳华自知他的活动已引起日本人注意，为了不连累亲属和乡邻，早已全家迁居在外，1942年9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姑父全家吃完早饭后，姑母在厨房里洗锅碗，只听得姑父走出大门后，有个北方口音的人问：“罗炳华在哪里？”姑父本来有点口吃再加上仓促间遇到陌生人问罗炳华，显得有些惊慌，便断断续续地回答：“不……不……知……知道。”接着是卜通一声，像是人倒地的声音，此后便寂无声息了。等我姑母走出大门一看，姑父侧身倒在大门外已断了气，喉头处有靴跟大的一个小洞，血还不停地向外冒着。据了解内情的人透露，是柏元用无声手枪杀害的。

“八刀半”秦高涛

祝匡时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日本侵略者马刀队旋即踏进贺胜桥。为逃避日军的蹂躏，当地群众纷纷转移到偏僻地区。该镇最大的一家当铺亦欲搬迁，到黄塔咀雇了八条渔船和十几名脚夫回镇搬运货物。那天正是阴历九月初五，他们把货物装满了六船，余下两只空船，计划带走部份逃难群众。货船开走后，约一个小时，正准备上船的群众不幸被日军马刀队发现，将其中九个手上有硬趼的青年推到一边，迫使出示“良民证”。当地尚未成立维持会，哪有“良民证”？眼看一场灾难即将临头。这时，一个彪形大汉挺身而出，对日军翻译说：“我们都是守规矩的良民，从小以捕鱼为生，手上的硬趼是常年驾船摇橹磨出来的。请太君放我们走！”日军小队长不相信，朝着一个打绑腿的青年吼道：“快解下绑腿！你就是中国兵，你们九个都是中国兵，统统地随我们开路！”九个青年，包括彪形大汉就这样无辜地被关进了日本兵营。

初六上午，九位青年推着饥饿的身躯由另一队日本兵和原来的翻译押到贺胜桥下，逼着驾船到咸宁甘棠去。青年们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谁也不愿驾船，而硬抗只会招致死亡。在这关键时刻，那个彪形大汉又站了出来，对翻译说：“先生，昨天那队太君检查我们时，你在这场，请你在这队太君面前，替我们说说情吧！”翻译究竟是中国人，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张条子递给日军小队长。小队长一看大怒，将纸条撕得粉碎，强令青年们驾船。翻译无可奈何，便请求给点饭青年们吃，说吃饱了好驾船。小队

长那里肯听翻译的话，指着青年们说：“你们良心大大的坏了，肯定是中国兵，要统统的死啦死啦！”说完，一挥手，众日兵一拥而上，用枪柄、刀鞘朝青年身上劈打。九位青年被打得皮开肉绽，然后拖到港南邬家坪。

到了邬家坪，日军小队长将一条绑腿撕成九条，分给每人一条，令大家把眼睛蒙住，站成一列，朝西湖跪下。小队长叽哩呱啦一阵，一名马刀手凶神恶煞地举着明晃晃的战刀扑到青年们的身后，自西向东，一刀一个，瞬间，九个青年全部倒入血泊之中。那些嗜杀成性的野兽才扬长而去。

深秋，湖边的凉风吹醒了那位大汉。他睁开迷糊的眼睛，仿佛作了一场恶梦，他不相信自己还活着。后颈有些麻木，伸手一摸满是鲜血，才知颈没有砍断。再看身边八位难友，全僵扑在地，有的身首分离，有的颈与肩仅少许皮肉相连，各种惨象令人目不忍睹！为了控诉日军的暴行，为了给死难家属报信，他用双手捧着下颌，用双肘双脚交换挪动身躯，挣扎着向湖边的一只小木船靠拢。正当他接近木船用臀部顶船下水时，突然跑来一位衣衫褴褛，满脸络腮胡的陌生人，迅速将他抱上船。大汉流着泪颤抖地说：“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助，我叫秦高涛，是湖西黄塔咀秦家村人，请你好事做到底，把我送回去！”陌生人默默地点点头。

船到黄塔咀已是深夜。一会全村男女老少闻讯赶来，挤满一屋，问长问短，无不唏嘘叹息，大家为秦高涛生还庆幸，为死难的乡亲悲泣，对日军的兽行义愤填膺。问及陌生人，方知原是国民党军的一个散兵，贵州人，由于身无分文不能回家，流落至此。于是大家七拼八凑弄了几块钱，送给他作盘缠。

秦高涛虽在屠刀下留得性命，但由于流血过多，伤口发炎，每天痛得死去活来，一直处于死亡的边缘。后来找到一位逃难到河塘的王会川医生，经过半年的精心治疗，方获新生。

秦高涛后来回忆幸免于难的情景说：“免于一死的原因可能

有两个：一是我排在末尾，一名日兵在连砍8人之后，手软了，只砍了半刀；二是我的眼睛没有完全蒙住，见刀劈下，就势向前一扑，未砍到气管，就昏倒在地”。

从此“八刀半”就成了秦高涛的浑名。它不仅记录着秦高涛的惊险经历，也是日本侵略军屠杀中国无辜人民的罪证。

（文史委整理）

参加中国驻印远征军经过

韩宗旭

1943年，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六个年头。国内战场，国军继续败退，日军占领长沙之后，沿湘黔路直逼贵州独山，威胁国统区的南大门；中印缅战场，盟军亦节节失利，缅甸大部分沦于敌手，国民政府赖以运输美援物资的大动脉——滇缅路被日军切断。当时虽有美国人陈纳德将军率领的十四航空队不畏艰险飞越海拔数千公尺的喜马拉雅山抢运，但运输量有限，杯水车薪难济各战场之急，且经常遭到日机拦截，安全毫无保障。此时重庆国民政府深深陷入困境。要解救危局，只有一个办法，迅速派遣一批有知识的青年空运印度，就地训练和武装。如此，既可以接收美援装备，又为打通滇缅路准备生力军。这就是1943年9月国民政府号召公教人员及知识青年志愿参加驻印远征军的背景。

国民政府对这次从军运动极为重视，大造声势，几乎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宣传工具和人力，报纸上每天都刊载从军的消息和鼓励从军的文章；党国要人亦纷纷出马，舌敝唇焦地宣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爱国的大道理。处在“大后方”的青年，除了汉奸，谁不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谁不为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而忧心忡忡，一股报国立敌的激情早已埋藏在心底，一经鼓动，骤然沸腾起来。不到一个月，仅四川省就有数千人投笔从戎，穿上了新军装。此时，我在四川自贡市保育院初中毕业，闻讯便也积极报了名。到年底以重庆、成都两地为中心，成立了三个教导团，直属军政部。

重庆教导团称为军政部教导第一团，设在江北师管区司令部

所在地鸳鸯桥。团长由师管区中将司令吴琅兼任。教导团下辖三个营十二个连和一个直属连。直属连皆系大专毕业生，其中有女兵一个排。所有学员一律为上等学兵。

1943年元旦，蒋介石亲自对教导团发表了广播讲话，给从军人员以殊荣和勉励。训练期间，军政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白崇禧、教育部长陈立夫先后到团慰问和训话。这三位大员，从外表到内心都呈现着鲜明的差别，何应钦白胖胖的，戴着银丝眼镜，一开口便大谈抗战之艰难，如果不是一身戎装，很难看出他是一员上将。白崇禧身材魁梧，声音洪亮，他要求大家严格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并讲述了孙子练兵的故事。陈立夫身材比较矮小，但派头十足，威风凛凛。他一走出汽车，吴琅立即上前敬礼，并帮助他脱下外套，双手抱在胸前。那时我们是不懂得什么是政治的，对诸如“四大家族”、“C.C”等一无所知，因此不免感到惊讶：堂堂中将司令对一个教育部长竟如此毕恭毕敬？陈立夫讲话的主旨亦迥然不同，他要求我们不要怕死。他说：“不怕死的人，一生只死一次；怕死的人，则经常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中。蒋委员长是不怕死的，在武汉空战时，他不进防空洞，而是站在庭院中观察空战情况。大家要以委员长为楷模，勇敢地杀敌，保卫国家”云云。

在党国要人的激励下，我们这些单纯的爱国青年，不免飘飘然，有的人居然把教导团看作北伐时的黄埔，竟然大唱起黄埔军校校歌来了；有的人则以班超、花木兰自居，俨然成了抗日救国之干城。

三个月的军事训练结束，五月中旬乘汽车赴云南昆明，然后空运印度。国民政府欲乘机宣传扩大影响，故在沿途各大城镇组织欢迎、欢送。庞大的车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带领群众夹道欢呼，锣鼓喧天，鞭炮声不断，热烈非凡。车队从重庆到昆明几乎走了半个月之久。

到达昆明已是月底，部队驻扎在昆华师范，等待空运。其间

曾邀请西南联大教授我们湖北同乡闻一多先生来团讲过话。闻先生身着长衫，言词慷慨激昂。他对大后方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现象痛下针砭；对我们的爱国行动则表示嘉许。他说：“国难当头，你们为了抗战宁愿抛弃学业和工作，远离家乡奔赴异域，而政府却让你们穿着草鞋！这是太不爱护青年了！你们也是父母的孩子，希望政府象你们父母一样爱护你们！”第二天，当地《正义报》发表了闻先生与讲话同一内容的文章。这是我第一次聆听闻先生的演说，第一次看到闻先生的文章。

担任空运的正是陈纳德所率的十四航空队。该队由于曾给日机以重创和在空运中功绩卓著，故又称为“飞虎队”和“空中堡垒”。此时美援物资全由该队从印度经过喜马拉雅山运入昆明。为安全起见，往往是夜间飞行，以躲避日机拦截。赴印那天，我们吃过早饭就开往机场等候，直到黄昏才陆续上飞机，每架飞机坐40人。机舱很大，没有座椅，几十人蹲在里面显得空空荡荡的。飞机起飞了，绕昆明一周往西飞去，地面上的万家灯火渐渐消失。此时，真的是“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我想起了花木兰，想起了班超，想着，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少时间，陡然觉得身体在往下沉，而且越来越热，似乎全身浸泡在热水中。睁眼一看，天已蒙蒙亮，下边是一片青绿色。机身徐徐下降，空气更加炽热。轰的一声，飞机停住了。这是印北的一座机场，也是中国驻印军的前站——列多。机场很大，停着一排排闪光发亮的飞机和崭新的十轮卡车。

我们下了飞机，即乘卡车到附近兵站休息。兵站是用几十座帐篷组成。从四季如春的昆明蓦然来到亚热带的印度，温差悬殊，令人难以适应，大家挥汗如雨，气喘吁吁。洗了澡，换上英印军服装（即印度军服装）：黄卡机军服、呢绑腿、白毛袜、半统黑皮鞋。此外还有两条毛毯、一条蚊帐、一件短大衣。我们所带的物品经消毒，再发还个人。由于接近前线，给养是甲等：大米饭、牛肉罐头；每人每天另发一袋给养，内有压缩饼干四包、白